

社会主义中国与未来的世界

——70年中国道路的启示与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欧阳向英

【摘要】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70年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使中国避免了苏联解体那样的悲剧，但与世界接轨的过程是复杂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变，但具体的制度安排可以调整，因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来释放生产活力，将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为社会步入更高阶段服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既存在竞争关系，也存在相互补充和借鉴的关系。长期来看，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不均衡发展的世界里，中国应该保持定力，同时保持足够的战略自省并将中国哲学的精髓“和”贯穿到国际关系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东方，但中国崛起的道路还很漫长。

【关键词】世界社会主义 国际秩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7.002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溯70年发展历程，中国有几个属性一直未变，即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独特儒家文化传承的东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属于“资社关系”中的“社”，“东西关系”中的“东”，而现有国际秩序是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现有国际格局中不占优势。这就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主要任务是立足国内，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发紧密。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身份无疑最令西方担忧和恐惧。中国既面临着“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协调问题，也面临着“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矛盾是无可回避的，视而不见只会使问题积累得更多更尖锐，而清醒认识当下世界和稳步构建未来世界将成为解决矛盾的前提。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成为新时期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

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俄罗斯政治和经济政策。主要著作有《西方经济学家与马克思的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等。

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也不断在改良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变换选择，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只有“雄鸡一唱天下白”，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本土化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思想，中国才在漫漫长夜中迎来了光明。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是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到门类齐全的工业国，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积累了一些问题。这是完全正常的。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并没有固定的发展模式和建设样本，需要我们奋进开拓，并在伟大斗争中将认识推向前进。1978年后，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果断实行改革开放，此后几代领导人坚持推进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使我国从工业国继续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总的来说，尽管在物质基础、思想认识和方针路线等各方面有所不同，但前30年和后40年并不矛盾，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艰辛探索，都有其阶段性和历史必然性。

改革开放使中国避免了苏联解体那样的惨剧，但与世界接轨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在融入全球的过程中，个别人思想动摇，甚至在全球化中迷失自我，希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有人以苏联解体为例，证明社会主义道路行不通，但忽略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根本不同，也忽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确立了社会主义道路后，关键是社会主义模

式问题，而模式是可以调整的，依据就是要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为社会向更高层次迈进提供条件。与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从思想领域、政治领域推行激进式改革不同，中国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了改善民生的渐进式改革，而后才是惩治腐败、加强党的领导等政治领域的改革。正因如此，中国的改革更多地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而更大程度上减少了政治投机分子和冒险家的话事权。更为独特的是，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仅用“做大蛋糕”解决了“分小蛋糕”的矛盾，而且使科技创新成为时代风尚，源源不断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这些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反观苏联，过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而当戈尔巴乔夫下了“一剂猛药”，要对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造”时，苏联经济加速下滑，跌入危机状态。^[2]加之思想领域陷入混乱、民族问题错综复杂、主权独立运动兴起、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在国内外各种势力联合动摇下，苏联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了。

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这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没有价值。首先，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出了最佳解决方案，希望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来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思路无疑是有价值的。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世界经济危机就会周期性爆发，就会提醒人们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终极的美好制度。其次，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等系列概念，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我们不否认这些概念是资产阶级革命首倡的，但它们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有条件的、虚伪的。只有实现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真正的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才会到来。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现



阶段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存在着各种问题，包括所有者缺位导致的生产效率不高、权力寻租导致腐败、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道德危机等，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其实，有问题的不是思想，而是从思想到现实这“惊险的一跃”。就连苏联的葬送者戈尔巴乔夫都承认，“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失败的是苏联所代表的制度”^[3]。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恰恰反映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要性。对于中国来说，“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4]中国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变，变了就是江山易色，就是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但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可以不断调整的，放弃改革就等于主动丧失了成长和进步的空间。这是我们在融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始终牢记的。

直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

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资本主义存在竞争的关系。如果社会主义不具有制度上的优越性，就没有打破资本主义链条并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必要和可能。社会主义要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一要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二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由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如何从制度上保障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就成为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的首要任务。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决定“以党内民主来逐

步推动人民民主”，再到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提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党的十六大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确立“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大明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每一步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越来越丰富清晰。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在国际舞台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大，这一切都有赖于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回顾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力量和世界格局的改变，既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和左翼运动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又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暂时处于相对稳定阶段，所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是我们对世情国情的基本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分为多种类型，而且随着工人运动和左翼思潮的兴起，资本主义也在不断调整自己对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股份制等形式引起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关系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正如希法亭所说，“随着股份制的扩大，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越来越成为这样一种有限制的所有制”，^[5]这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间既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也存在相互补充和借鉴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合理成分，我们当然可以参照和采用。有人担心，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不断调整，是不是可以调整到与资本主义一样？就是说，调整是否存在着边界或限度。这涉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判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这里面没有任何具体政治、经济体制的规定，说明在具体层面起作用的都是手段，而不

是目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来释放生产活力，将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为社会步入更高阶段服务。由此，我们得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核心结论。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力，那是因为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所以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活力，但它有两个弊端，一是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会拖累生产力发展；二是资本主义必然会造成两极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所以，在发展问题上，时间在社会主义一边，正义也在社会主义一边。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区别，在于发展模式的不同。如果说“华盛顿共识”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代表，而“北京共识”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典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都对“中国奇迹”抱有强烈的关注，并对“北京共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是一种更渴求公平的、以优质增长推动的发展方式，它要求以慎重的态度对待诸如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观念，目标是在实现增长的同时保持独立；“北京共识”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7]其实，中国学者在解释“中国道路”的时候，往往会强调“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产物，具有自身的制度内生性，并没有定型，也没有向其他国家输出的意图。而相对于主张和平共处与价值多元的中国，西方表现出更多的排他性和攻击性。有着“当代的托克维尔”之称的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认为，“美国比欧洲更加保守，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右派国家”。右派的两个主要思想观点——国内的放任主义和国外的孤立主义，曾经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猛烈抨击，如今却变成了美国特色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石。^[8]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一个国家，^[9]这种对内的“精英优先”思维正在转化成对外思维，也就是“海盗式资本主义”或“赌徒式资本主义”正在取代马克斯·韦伯的清教伦理式资本主义，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更

加导向“美国至上”，加速向单边主义倾斜。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弱势的一方通过谈判寻求平等地位是无效的，只有能够制衡的实力，才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在不均衡的世界里如何自处与共处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什么说百年未有？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的。苏联成立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平行发展。虽然美苏争霸给世界和平带来风险，但两者力量大体平衡，相互制约，世界的结构总体是稳定的。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为削弱，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因此，有福山“历史的终结”一说。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世界历史似乎再无制度竞争了，然而，历史的进程并不总像人们预料的那样。一国独大的美国发展得并不那么顺利，相反出现了衰落的势头。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强大”，就是为了挽救美国的危机。美国的霸权地位被撼动，使世界的整体结构不再稳定，这是百年未有之现象，也是当今世界动荡变得更加频繁的一个结构性原因。那么，大变局的“变”体现在哪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和印度在东方强势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迅猛发展，出现“东升西降”的现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80%。原来的弱国小国呈现群体性崛起，这个力量绝不能忽视。

第二，国际规则处于调整期。国际规则主要通过全球性国际组织来实现，而二战后形成的主要国际组织基本上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然而，特朗普政府认为，现行的国际规则让美国吃了亏，其他国家都是搭便车的沾光者，美国不能容许，所以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万国邮政联盟,最近又退出《中导条约》,给国际安全带来隐患。国际组织的走向不明,国际规则面临调整,给世界带来不确定性。

第三,世界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一方面制裁俄罗斯;另一方面围堵中国,必然导致中俄合作进一步加深,而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不等边发展。同时,美国与盟国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欧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美国嫌隙扩大,貌合神离。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试图摆脱美国的束缚,走上战略自主的道路。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局势不会风平浪静。

在这样一个不均衡发展的世界里,首先,中国应该保持定力,同时保持足够的战略自省。有人认为,随着中美贸易冲突的升级,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将终止。其实,中国的战略机遇不是别国施舍的,也不是单靠劳动力价格低廉获得的,而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创造的。从空间看,战略机遇来自战胜重大挑战;从时间看,战略机遇来自长期科学发展;从全局看,战略机遇来自宏伟战略构想。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存在,能否把握住,归根到底在中国自身。国际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中国的发展,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崛起的根本要素在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组织形式,所以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制度安排。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还要理顺生产关系,通过合理的分配政策逐步缓和化解内部矛盾,包括复杂的民族矛盾,为和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内部支撑。拥有有利的外部条件当然好,没有有利的外部条件也不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政治上坚

持独立自主、经济上依靠自力更生,某种程度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政策。如今,即使事态再度发展到这一步,我们也不必惊慌,因为中国早已不再是刚建国时百业凋敝的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拥有十几亿具有爱国奋斗精神的人民,有一个英明睿智的共产党,这些都是我们战胜外部困难的有利条件。

中国从此会改变自己的对外战略,重新成为一个封闭国家吗?绝不会。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中国哲学的精华在于“和”。“和”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求同存异,在斗争性中把握同一性,做到异质文化的兼容。在国内,中国要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中国要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精神实质都是“和”。与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着共同开拓发展空间、推动世界秩序向更公平更合理方向发展的一致诉求;与发达国家,我们有着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难题、守护人类地球家园的重要使命。利益一致、责任相同,这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入到新阶段。“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顶层设计前所未有,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纷纷加入,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了条件。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公平包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分配不均的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上的根本差异。中国与世界的政治交往有和谐,也有斗争,维持同一性的关键在于坚持国际民主原则。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第三世界的兴起及其国际分量的大大增加,是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重建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的现实基础。“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10]在当前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愈加有必要重申国际民主对国际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

考察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有无觉醒的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的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根本原因；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11]“资本内在否定性”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逻辑内核，“资本—劳动”为轴心的社会结构使工人阶级居于不利地位，但跨国资本和跨国生产重塑了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使社会动员和政治认同更加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发达国家工人意识的觉醒不仅要靠他们自己，更取决于国际合作。然而，一方面中国不会输出自己的制度；另一方面美国左派坚持的是个人主义，而非其他国家和地区左派普遍信仰的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这是美国工人阶级的真实现状。所以，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

体系》中写道：“现代世界的标志是它的受益者的想象力和被压迫者反对他们的断然态度。剥削与拒绝接受剥削或者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构成了现代持续的对立，二者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在20世纪还远远没有达到最高潮。”^[12]好在欧洲有社会主义思想传统，虽然目前不是主流，但从未间断。

从历史上看，欧洲是资本主义多样性表现最为充分的地区。有学者指出，以往欧盟过分强调统一性，忽略了多样性，这可能是欧元区爆发危机的原因之一。不仅多层级政治组织内国家与超国家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而且欧洲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也存在政治分裂，这对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起到了阻碍作用。考察西欧各国，它们于经济高涨时期确立的社会福利制度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出现危机。高福利制度使西欧国家陷入两难困境：欲缓解财政压力，需改革福利制度，但改革遭到民众反对，引发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要维持社会稳定，需放弃改革，而维持高福利制度又导致国家财政危机。尽管如此，改革福利制度是必然的发展趋向。或许到那时，社会团结程度将下降，被压迫群体将觉醒。还如沃勒斯坦指出的，“虽然在整个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以前社会的意识形态仍居于统治地位，但越来越多的阶层首先并最终是按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方式行事。他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权利。这实际上是我们论证的中心问题。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都还没有兴起。但他们的实践活动已经对社会行为构成了主要的制约力”。^[13]美国和欧洲的工会发展状况实证了这一观点。经过近三十年政治和经济的倒退，尤其2008全球经济衰退以来，美国劳工运动面临着可能最为严重的危机。有人寄希望于在美国内部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反资本主义阵营，包括工薪阶层的非洲裔、拉丁裔、亚裔、太平洋岛民和土著居民，也包括街头小贩、日工和性工作者等非正式工人，还包括劳动妇女、年轻人、同性



恋、变性人和有组织的白人工人，以及失业工人和被监禁的人，他们是阶级斗争扩大和锐化的基础。^[14]劳工组织在欧盟层面最重要的跨国工会“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在2008年之后也面临危机。工会虽然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欧洲社会模式，但却并不质疑欧洲的新自由主义一体化方案，也不挑战其社会经济基础，因而，严重限制了其斗争的成效。^[15]综合全球形势来看，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还在东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全面超越资本主义，需要在社会公正、政府廉洁、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不断完善和加强。应充分发挥工会在协调资方和劳方利益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和社会保险法，保障工人享有人格尊严和应有待遇，在公平和效率维持动态平衡的基础上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应进一步完善党的组织纪律，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完善群众监督责任制，使政府廉洁高效运行，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动力支撑。应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应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妥善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的现实问题，将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好。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但这个过程还很漫长，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保持清醒头脑，坚定道路选择的方向，并付出艰苦努力。

注释

[1]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2]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苏联经济和社会指标一落千丈，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也逐步从高速—低速向停滞—危机的方向发展。从1988年下半年起，全苏36个大城市实行分配卡制度，1200种生活消费品中有1150种供应不足。1990年出现了战后第一次

负增长。1991年底内债增至10000亿卢布，外债高达1200亿美元。与此同时，财政赤字也急剧增加，1990年突破了1000亿卢布大关。货币发行量的严重失控引起通货膨胀，而商品的全面短缺和消费基金过猛增长，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1991年，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年增长了1.4倍，集贸市场价格增长两倍，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贸易价格9倍，上半年通货膨胀率为33%，8月份以后每天的通货膨胀率达2%~3%。“短缺”加剧了紧张局势，成为时代特征。

[3] 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4]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5] [奥]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1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7] 乔舒亚·库珀·雷默：《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金融时报》，2004年5月7日。

[8] [英]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英]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王传兴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导论第17页。

[9] 1980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是工人平均工资的40倍，今天这一比例扩大到了超过400倍，如果按照资产而非收入来看，差距还会更大。1%最富有家庭控制了美国38%的财富，是底层80%家庭总数的两倍之多。转引自“Would You Like Your Class War Shaken or Stirred, Sir”,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4, 2003.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9~36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2页。

[12]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路爱国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3页。

[13]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尤来寅、路爱国等译，第367页。

[14] Williams, S. & Awatramani, R., "New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and the Social Movement Left", *Socialist Register*, 2015, 51(0).

[15] 王铁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盟工会与欧盟治理——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角的考察》，《欧洲研究》，2015第4期，第82~98、6页。

责编 / 肖晗题

The Socialist China and the Future World —Insight and Thoughts on the 70 Years of China Road Ouyang Xiangying

Abstract: The year 2019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flecting on the 70-year development process, China has avoided the tragic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 up, but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 is complex.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China must not be changed, but the specif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can be adjusted, becaus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socialism is to unleash the potential of production, develop the productive forces to a higher level and serve the society at a higher stage by constantly adjusting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but they also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the long run, socialism is bound to triumph over capitalism. Today's world is facing changes never seen in the last century. In a world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maintain confidence as well as sufficient strategic introspection, and apply the ess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rmony"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 as to build a 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destiny. The future of world socialism is in the East, but the road of China's rise is still long.

Keywords: world socialism, international order, socialis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pitalism